

魯迅、周作人和老*

劉正忠**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摘 要

魯迅與周作人雖然屢發「反老人」的公共話語，卻都無法全面地與「老」的文化決裂。事實上，他們異於「新青年們」之處，正在於深忱於「老之惡」而又頗迷於「老之魅」。中國文化具有深厚的尊老傳統，甚至將它美學化與思想化。但在近代中國，面對國族危殆的處境，知識分子充滿「返老還童」的欲望。周氏兄弟固然參與這股潮流，卻也能夠轉化傳統資源，各自建構一套「老」的思維，與青年對蹠。考索其歷史因緣與內在矛盾，當可照見五四新文人的精神世界。

關鍵詞：五四時期，返老還童，老之魅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魯迅、周作人和老」(NSC 99-2410-H-007-059-) 研究成果。初稿曾宣讀於北京大學主辦「周氏兄弟與文學革命」學術研討會（北京：2018 年 9 月 22 日）。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zzliu@ntu.edu.tw

一、前言

魯迅 (1881-1936)、周作人 (1885-1967) 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兩位大師，既展現了共同的思考脈絡，而又各自樹立了不可磨滅的典型。他們都有極厚實的傳統文化涵養，同時積極吸收外來資源，在新舊交替的時代夾縫中，創造出質量可觀的文章。無論就性格、思想或美學實踐而言，周氏兄弟都顯現了一種複雜性；探討其成因，應有助於理解漢文化的現代轉換。惟與其寬泛地以「愛恨交織」來形容他們的傳統觀，不如從一些具體概念著手。而「老」及其週邊，便是涵容量頗大而又尚未充分探索的課題。

依照一般理解，二周都頗與五四「反傳統」的主潮合拍，積極抨擊傳統文化的「老大」成分並提倡「少年」精神——魯迅為「救救孩子」而大聲疾呼，周作人則主張「婦女與小兒之重新發現」的「人的文學」。但細究他們的思維底蘊，孩童與青年（以及其所代表的純真、熱情、健康的價值）為希望之所寄，這個信念似乎是比較堅決的。但是老者呢？中國傳統文化向來有一種「尚老」思維，並衍生為一種美學結構與社會價值。魯迅與周作人雖然都屢發「反老人」的公共話語，但實質上，恐怕都無法全面地與「老」的文化決裂。甚至可以說，他們異於諸多「新青年」之處，正在於深忱於「老」的積弊又能重製其魅力。

年老，雖然意味著身體機能的衰落，但也常是經驗與智慧的表徵。由於中國文化以家族為本位，高揚「孝」的倫理，因此「老」的文化也就顯得格外廣闊而縝密，甚至被發展為一種思維結構或審美觀念。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¹在階序上，年老成德之人甚至高於典刑法則，這種思維逐漸衍為一種「尊老敬賢」的社會傳統。於是，「老」在歷史上也經常被神話化——彭祖為養生之極致，老聃是智慧的象徵，張良從黃石老人得奇謀，呂后藉商山四皓定大位。尚老觀也被推及萬物，衍為「物老成魅」之說，把年歲視為變化的要素。到了後世，「老」更被轉化為審美範疇，形成「老勁」、「老辣」、「老以健」、「老而媚」等概念；²不僅用來評述詩文書畫，亦可施之於物，指稱一種蒼勁的美感。

「老」的價值在近代國族危機之下，開始受到知識分子抨擊。晚清志士每以救

¹ 毛亨傳，鄭玄箋，《毛詩鄭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3），卷18，〈蕩〉，頁2。

² 汪湧豪，《中國文學批評範疇及體系》（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頁274-278。

亡圖存為念，深恨國族之衰老病弱。梁啟超 (1873-1929) 認為：

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所未經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好行樂。惟多憂也，故灰心；惟行樂也，故盛氣。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苟且也，故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³

這個二元框架具有此優彼劣的價值判斷。返老還少的敘述，再現了一種國族擴張與長生的慾望。⁴ 梁啟超想像，國之老少是可以製作的，只要自強變革，則中國還可以「少年雄於地球」。在同時期的政治小說裡，甚至勾勒出「雜種少年，混血中國」的形象，可見他以「少年—啟蒙—新中國」的宏大企圖。⁵

惟貶老而揚少並非絕無可疑。蓋情感或審美上的「老」，未必導致思想之「守舊」。老少之辨涉及目的、立場與語境，並非全是本質，而亦來自建構。二周的「老」觀，既延續「傳統中國文化」的視野，又融合「近代中國情境」，最能展現此一議題的多重面貌。他們既參與了新起的「崇少」論述，又深知固有的「尚老」思維，故能超越老少對蹠的局面，成為新舊文化的接駁點。惟二周皆為個性強烈的大師，同樣洞察古今而又各具姿采；兩家並論，雖難遍照細節，但經由對比之中，應更能展示問題的核心。

學界對於「少年」在近現代文學中的演變，探索較深，可資借鑑者頗多。惟本文以「老」著題，仍有若干新義：首先，「老」並非「少」的簡單對立面，不僅相互涵攝，還有獨特的議題可待開展。蓋「老」在傳統裡，有更豐富的倫理性質與美學意義，非「少」所能比；其意涵在近代遭受衝擊，但並未全盤撤退，反而激出新貌。其次，創作主體總是由「少」向「老」位移，老更接近於「主體」而非「對象」，是歸穴而不僅為路徑。通常在小說中，「少年」更多地被隱喻化，從而相當

³ 任公（梁啟超），〈少年中國說〉，《清議報》，35（橫濱：1900），頁 2249-2250。

⁴ 劉人鵬，〈「西方美人」慾望中的「中國」與「二萬萬女子」：晚清以迄五四的國族與婦女〉，《清華學報》，30.1（新竹：2000），頁 1-47。

⁵ 梅家玲，〈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漢學研究》，19.1（臺北：2001），頁 249-276。

程度地被注入國／族的想像。本文則聚焦於散文，其中的「老」有切身性與實體感，非僅象徵而已。

二、魯迅與「老」

(一)老與少的「中間物」

早在南京求學時期，魯迅即深受赫胥黎《天演論》（嚴復譯，今譯：進化論與倫理學）的震撼。留日習醫，則更深入理解生物進化論與自然科學。赫說以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的法則為「宇宙過程」，以道德情感的不斷改良為「倫理過程」，後者尤為人文學所能著力。青年魯迅寫了〈人之歷史〉（1907），專門介紹生物進化論的世界觀，這種思維持續到五四時期，給予他戰鬥的動能。他相信「將來總有尤為高尚尤近圓滿的人類出現。」⁶ 而其希望即在下一代。假如中國人不自我改造，跟上進化的腳步，終將沉淪於低等。

然而在倡導科學與物質變革之餘，魯迅覺悟到精神與倫理的破舊立新，在當時顯得更為迫切。因此，在〈文化偏至論〉（1908）、〈摩羅詩力說〉（1908）等名篇裡，倡抗爭以救亡，張個性以啟蒙，已展示出一種推尊「青年性」的思路。他還認識到，中國傳統的家庭倫理乃是束縛個體自由與創造力的關鍵。五四前夕，他用白話文作的第一篇論述〈我之節烈觀〉（1918），即在質疑舊式的「畸形道德」根本就不是道德。先要改良舊道德，最為弱小的婦女與孩童才能得到解放；而種種改良，皆須以撼動父權為前導。

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多為一代「新青年」，因而在「反老」的立場上頗為堅決。魯迅作為其中少數的中年人，在抨擊老大傳統、崇尚新生世代的思維上，最初頗與「新青年們」一致。尤有甚者，緣於一種自以為也「吃過人」的負疚感，他說得比別人還要激進：

⁶ 魯迅，《熱風》，收入魯迅著，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三十年集》第4冊（上海：魯迅全集出版社，1947），〈隨感錄四十一〉（1919），頁42-43。按《魯迅三十年集》為最早之魯迅全集本，雖遺漏了翻譯部分及其他零星資料，但因時代相近，用字（如「復仇」寫作「復讎」）與標點都較接近魯迅原文，沒有簡體字版或簡體轉正體版之失真。本文引用魯迅文章，如：《墳》、《朝華夕拾》、《華蓋集》、《三閒集》、《吶喊》、《南腔北調集》、《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末編》、《二心集》、《且介亭雜文》、《魯迅書簡I》等，皆出自此版。

論到解放子女，本是極平常的事，當然不必有什麼討論。但中國的老
年，中了舊習慣舊思想的毒太深了，決定悟不過來。譬如早晨聽到烏鴉
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卻總須頹唐半天。雖然很可憐，然而
也無法可救。沒有法，便只能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
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
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⁷

魯迅之異於梁任公者，在於不只把老少之喻鎖在國族問題上，而能推拓到文化、社
會、家庭等多重面向。使得老與少除了「隱喻」，還是活生生的「現實」；除了涉
及外在對象（世界—國家—民族），還把「自我」給滲透進去。他悄然將「老」和
「毒」和「黑暗」連繫起來，具體示例，並且提出可能的行動：那便是「肩住黑暗的
閘門」。孩子們看似弱小無知，需要保護，但夏濟安曾根據這個意象的原典判
斷：負重的大人跟「孩子們」有共同的地方，他們都是「叛徒」。⁸ 也就是說，魯
迅認為自己和孩童、青年是革命上的同志，而他這類中年人更應承擔犧牲的任務。
不過，這負重的大人也有與「老人們」共同之處，他是共犯結構的一員，只是用罪
惡、痛苦換來了覺悟。

在〈摩羅詩力說〉裡，魯迅檢討了中國人「慕古」的世界觀。那種重在過去，
人安於天的想像，在他看來，明顯違反「人類進化史實」。到了五四，他更明確以
進化論為憑藉，重整倫理框架：

生命何以必需繼續呢？就是因為要發展，要進化。個體既然免不了死亡，
進化又毫無止境，所以只能延續著，在這進化的路上走。走這路須有一
種內的努力，有如單細胞動物有內的努力，積久纔會繁複，無脊椎動物
有內的努力，積久才會發生脊椎。所以後起的生命，總比以前的更有意
義，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價值，更可寶貴；前者的生命，應該犧牲於
他。⁹

對照於前節所述「尚老」觀（以古代、聖人、長者為理想版本），魯迅此說更強調

⁷ 魯迅，《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1919），頁 115。

⁸ 夏濟安著，林以亮譯，《夏濟安選集》（臺北：志文出版社，1971），〈魯迅作品的黑暗面〉，
頁 27。

⁹ 魯迅，《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頁 117-118。

生物性（而非文化性）。他就共體生命之發展來看世代問題，如非得犧牲個體，應該以前一代為先；因為在進化的路途上，後一代總是更接近理想，更有價值。然而中國式的農業社會，基於土地繼承與祖宗祭祀之需要，特別重孝敬老；「祖宗—父親—舊倫理」經常被連鎖在一起，阻礙了科學與民主。¹⁰

於是魯迅明確提議，中國社會須由「長者本位」向「幼者本位」轉移。除了從進化論尋求理據，他還援引了中國舊有的「父子間沒有什麼恩」之說來與「聖人之徒」辯詰。——事實上，這條思路也正是五四諸子所同然的，就在稍早，胡適便曾發表過一篇題為〈我的兒子〉的新詩：「樹本無心結子，／我也無恩於你。／但是你既來了，／我不能不養你教你，／那是我對人道的義務，／並不是我待你的恩誼。」¹¹ 在後續的論爭裡，胡適發揮了王充、孔融以來的「父母於子無恩」論，再參之以西方近代學說，批判了傳統的養兒防老觀。——魯迅進一步認為，「恩」建立在責望報償的綱常中，應予取消，而代之以真誠的「愛」。¹²

論者指出，「孩童」在《吶喊》(1922) 裡是「待拯救者的受害者」，而在《徬徨》(1926) 集裡卻成了「庸眾的共犯」，顯現魯迅在高喊救救孩子的同時，也為他們套上「意識型態的牢籠」。¹³ 但若將目光移向散文，則魯迅筆下的孩童尚有些「非關國族」的鮮活樣態。例如〈二十四孝圖〉(1927) 這篇回憶性文章裡，魯迅更具體描繪出以長者為主的倫理觀，如何衍生出諸「郭巨埋兒」、「曹娥投江」之類違情悖理的敘事。¹⁴ 而他著力於把孩童從無盡幽黯中解放出來，便立基於成長期的體驗。

魯迅確實運用過「長者／幼者」、「孩童／成人」之類的說法，但在更多的情況下，他已敏銳地意識到生命階段或狀態的複雜性。這便可以連繫到他所謂「中間物」的概念：

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

¹⁰ 殷海光，〈成見與進步〉，《文星》，5.5（臺北：1960），頁 5-9。

¹¹ 適（胡適），〈我的兒子〉，《每週評論》，33（北京：1919），第 3 版。按魯迅的文章作於是年 9 月，刊於 11 月《新青年》第 6.6 期，略晚於胡詩。

¹² 魯迅，《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頁 119。

¹³ 顏健富，〈發現孩童與失去孩童——論魯迅對孩童屬性的建構〉，《漢學研究》，20.2（臺北：2002），頁 301-325。

¹⁴ 魯迅，《朝華夕拾》，〈二十四孝圖〉，頁 26-33。

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¹⁵

汪暉認為，中間物之說「包涵著魯迅對自我與社會的傳統與現實之間的關係的深刻的認識」。¹⁶ 這個概念使魯迅對許多事情的看法，經常保持於一種動態發展的狀態。在進化論的影響下，五四時期的魯迅對於進步、未來、新生確實期待頗深，故常自居於「由舊變新」、「由弱變強」、「由鬼變人」的中間物，希望發揮一種階段性的作用。這跟他作為一個「來自舊壘」的中年人（而非「新青年」）有很大的關聯性。

然而在「進化論」的顯層認知之外，魯迅思想的深層結構裡，另有一種與此恰成逆反的「末世論」圖像——相信人類終將走向歷史的盡頭，而常懷沉淪、頹廢、死滅、絕望的陰影。¹⁷ 在進化論觀點下，追求「一代強過一代」似為必然；但在末世論陰影下，他不免懷疑更年輕的一代真的帶來希望嗎？正如他所深愛的名言：「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在他自己的身心狀態逐漸往「老」位移的過程中，對來者的期望從來未消，但憂慮卻也逐漸強化。這使得魯迅的「老」透顯出很豐富的內涵，不僅是傳記意義的「晚期」，更充滿思想、情志乃至文化的辯證結構。

（二）與「革命青年」辯詰

李長之（1910-1978）曾為魯迅的「精神進展」分期：在新文化運動伊始（1918-1924），魯迅以精神界戰士之姿，批評封建文化，「他的攻擊，在這時還比較空洞，敵對的東西多半不在身旁。」稍後兩年（1925-1926），時局日惡，特別是女師大事件，把他徹底捲入爭議中。於是「人情世故，作了魯迅鬥爭的目標。所以這回是較為具體了，而且更切身些了。」¹⁸ 魯迅後來續有發展，但這次轉變實居於關鍵，具有內外兩層意義：一方面是確立了「猶豫而狐疑」的主體狀態，在希望與絕望，青年與中年間反覆辯證；一方面是陷入了長期的「多面作戰」的情勢，小說寢息，論爭性的雜文轉居主導。

¹⁵ 魯迅，《墳》，〈寫在《墳》後面〉（1926），頁 262。

¹⁶ 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 183。

¹⁷ 伊藤虎丸，《魯迅と終末論——近代リアリズムの成立》（東京：龍溪書舍，1975），頁 188-190。依照伊藤的看法，章太炎〈四惑論〉對「進化論」的批判，可能對魯迅頗有啟發。除此之外，中國民間信仰普遍存在的末世想像，應當也影響了魯迅的思想。

¹⁸ 李長之，《魯迅批判》（上海：北新書店，1936），頁 10-11。

魯迅自始至終都站在青年的一邊，鼓舞他們對抗老大顛覆的舊社會。因此，罵魯最力的蘇雪林（1897-1999）便屢嘲弄他以「青年導師」自居，敗壞青年的心靈。¹⁹ 然而，我們還須注意到魯迅「與青年對蹠」的一面，才能理解他的深刻與繁複。這種卡在老人們與少年們「之間」的意識，大約始自 1925 年，與「正人君子」論戰之前：

我於是就拋了死相，放心說笑起來，而不意立刻又碰了正經人的釘子：說是使他們「失望」了。我自然是知道的，先前是老人們的世界，現在是少年們的世界了；但竟不料治世的人們雖異，而其禁止說笑也則同。那麼，我的死相也還得裝下去，裝下去，「死而後已」，豈不痛哉！²⁰

所謂「老人們的世界」係指封建保守的年代，只有長者能夠「自由」施展。沒想到新出的「少年們」，依然被馴化在一種言說框架裡，習慣於「死相」文章（缺乏血氣與意志），而反對破格說笑。魯迅開始警覺到，青年並不必然導向進步性或開放性。於是，他對「青年導師」一詞進行拆解：先是質疑青年之優位性，「近來很通行說青年；開口青年，閉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論？」²¹ 五四以來，文化界瀰漫著「青年崇拜」的氣息，但魯迅認為，只有「要前進的青年們」才值得一顧。其次則論證導師之不必要（同時也就反省了自己的位置），因為前一代無法成為後一代的示範者，而仍然只是探求者。

魯迅的思想經常是踐履性的，每在戰鬥體驗中養成起來而又回饋於世界。稍後，與高長虹（1898-1949?）之間的糾葛，便帶給他頗大的衝擊，使其核心思維起了一種破裂與重組的歷程。按長虹本與魯迅極為親近，一旦反目，乃發出毫不留情的攻擊。而其用語，又多涉及世代議題：

〔魯迅〕遞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卻奮勇的戰士的面目，再遞降而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幾不知其他矣。……須知年齡尊卑，是乃父乃祖們的因襲思想，在新的時代是最大的障礙物。魯迅去年不過四十五歲，豈明也大抵在四十上下，如自謂老人，是精神的墮落！思想呢，則

¹⁹ 蘇雪林，《我論魯迅》（臺北：文星書局，1967），頁 57。

²⁰ 魯迅，〈忽然想到（五）〉（1925），《京報副刊》，122（北京：1925），頁 4-5；後收入魯迅，《華蓋集》，頁 44。

²¹ 魯迅，《華蓋集》，〈導師〉（1925），頁 56。

個人只是個人的思想，用之於反抗，則都有餘，用之於壓迫，則都不足！²²

高魯之爭，或緣於長虹敏感易受傷的神經質性格，或緣於他對許廣平的單相思，自有其脈絡可供考索。²³ 無論如何，這種來自激進青年（而非保守舊陣營）的挑戰，多少使魯迅感到灰心。長虹批評，周氏兄弟生理上還不算老，但精神、思想、意態上卻是墮落為「世故老人」了。雖然還有反抗傳統的餘力，但自己本身卻形成新的老大「權威」，想要壓迫年輕人新生的力量。

長虹在《狂飆》大肆攻擊二周，足足罵了一年。他使用各式怪異的文體，瑣瑣計較往事並評議魯迅的人格，如云：

公理：彼等在出版界的歷史上頗有價值，今若墮落，未免可惜。

正義：我深望彼等覺悟，但恐不容易吧！

公理：我即以其人之道反諸其人之身。

正義：我來寫光明日記——救救老人！

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還有？

救救老人!!!²⁴

這裡模擬〈狂人日記〉句式來嘲弄老人，還刻意放大字體。魯迅的回應文章，輯錄長虹前恭後倨的文字而不贊一詞，以展示其矛盾糾葛。²⁵ 正如錢理群所指出的，此一事件迫使魯迅集中清算了「青年至上觀」對自己的消極影響，突破進化論的侷限。²⁶ 此後，他不再單向地否定老人，開始玩味老的沉鬱與精深，並對青年的性質進行較細緻的分析。

²² 長虹，〈走到出版界〉之「1925年，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狂飆》，5（北京：1926），頁141-147。

²³ 廖久明，《高長虹與魯迅及許廣平》（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月亮」風波〉，頁151-191。

²⁴ 長虹，〈走到出版界〉之「時代的命運公理與正義的對話」，《狂飆》，10（北京：1926），頁299。

²⁵ 魯迅，《魯迅三十年集補遺》（香港：新藝出版社，1967），〈「走到出版界」的「戰略」〉（1926），頁49-53。

²⁶ 錢理群，《走進當代的魯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魯迅與進化論〉，頁421-422。

接著在 1928-1929 年之間，「革命文學派」對魯迅的「圍剿」，更進一步影響其主體樣態。依照右派之說，此戰有「招納」之意，由中共在背後引導，其結局是將魯迅推向左聯盟主的位置。²⁷ 但有學者認為，少壯派原不擬專對魯迅攻擊，但因他不斷反擊，才成為眾矢之的。²⁸ 其中最具系統性的批評來自太陽社的錢杏邨(1900-1977)，他說：「舊皮囊不能盛新的酒漿，老了的婦人永遠不能恢復她青春的美麗，阿 Q 正傳的技巧隨著阿 Q 一同死亡了」。²⁹ 也就是說，假如魯迅不能接受馬列主義的洗禮與共產黨的指引，終將是「落伍者」而為時代所淘汰。

此文反覆動用「老」、「死」意象來刺激魯迅，譏其空有舊情感而無新觀念。「老」從此成了青壯派罵魯的共通話語，例如：馮乃超稱他「老先生」，責以「依然賣弄他的老生腔調」，³⁰ 常燕生稱他是「踏在新舊界過渡線上的老新黨」，³¹ 弱水說「老頭子的確不行了」。³² 葉靈鳳則畫了一幅醜化的漫畫，並寫道：「陰陽臉的老人，掛著他已往的戰迹，躲在酒缸的後面，揮着他的『藝術的武器』，在抵禦着紛然而來的外侮。」³³ 杜荃（郭沫若）嘲弄他為封建餘孽，進而誣指「殺喲！殺喲！殺喲！殺盡一切可怕的青年！而且趕快」是魯迅這位「老頭子」的哲學。³⁴

這場兼具必然性與偶然性的惡鬥充滿「陰面的戰法」（魯迅語），雖以和解收場，其歷程仍然驚心動魄。革命青年以「革命思想」之有無來界定青年性，輕易稱前驅為「過時」；而魯迅對於青年「以籍貫、家族、年紀」來奚落對手，則極感忿恨。³⁵ 事後，他總結自己青年觀的變化：

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對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然而後來我明

²⁷ 鄭學稼，《魯迅正傳》（臺北：時報文化，1978），頁 165。

²⁸ 王宏仁，《魯迅與「左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頁 9。

²⁹ 錢杏邨，〈死去了的阿 Q 時代〉，《太陽月刊》，3（上海：1928），頁 22。

³⁰ 馮乃超，〈人道主義者怎樣地防衛著自己？〉，《文化批判》，4（上海：1928），頁 52。

³¹ 常燕生，〈越過了阿 Q 的時代以後〉，《長夜》，3（上海：1928），頁 9。

³² 弱水，〈談中國現在的文學界〉，《戰線》，1（上海：1928），轉引自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魯迅書信注譯組編，《「圍剿」魯迅資料選編 1927-1936》（北京：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魯迅書信注譯組，1977），頁 10。

³³ 葉靈鳳，〈魯迅先生〉，《戈壁》，2（上海：1928），頁 1。

³⁴ 杜荃，〈文藝戰上的封建餘孽——批評魯迅的「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創造月刊》，2.1（上海：1928），頁 148。

³⁵ 魯迅，《三閒集》，〈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1928），頁 113。

白我倒是錯了。這並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後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³⁶

經此一戰，他充分體認到「老／少」、「新／舊」、「進／退」的辯證性，因而擴充了「疑」的思維。論戰之後，他雖接受了中共的史觀、思維、策略與領導權，但並沒有屈服於創造社、太陽社那套一味崇少尚新的思路。——他依然善用多重性，並且更為自覺地去開發「老」的價值，對於某些掛著政治令旗而出言不遜的青年亦從未抹去心中的不屑。³⁷

(三)做為「世故的老人」

論敵屢稱魯迅為「世故老人」，實有部分的理據。魯迅曾說：「有誰從小康人家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精確來說，他出身於「破敗的大戶人家裡」，身為長子，出入病榻與藥店之間，看盡了世態人情的炎涼，也被迫練就了一套應世之道。³⁸ 就連「世故」一語，也是他率先用以自嘲。³⁹ 正因他長久受累於世故，深知要運用其原理，才有辦法回擊世故——這也正是他自認可代勞於青年的。因此，在與「正人君子」交鋒的過程中，他所賴以為論證資源，並設定為攻擊目標的，同時也就是世事洞明、人情練達的社會成規。

所謂「老練世故」，原非負評；⁴⁰ 後來逐漸落入天真、誠摯、清澈的對立面，遂有了褒貶雙重性。無論當時或後來，論者以「世故」稱魯迅，多半不是恭維。蘇雪林「老毒蛇」之類過激的惡言，就不必多說了。鄭學稼的《魯迅正傳》做為詆魯名著，立有「十四年僉事」一章，譏其久居官場且不無眷戀。十四年間，教育總長更易了二十七人，「在那齷齪的世界中，神聖的革命者，是無法一日安居其位的。」⁴¹ 並附有「魯迅的收入」一章，說明他雖常罵當局，上海時期仍以「大

³⁶ 同前引，〈序言〉(1932)，頁10。

³⁷ 曹聚仁，《魯迅評傳》（香港：世界出版社，1956），頁124-126。

³⁸ 魯迅，《吶喊》，〈自序〉(1922)，頁6。

³⁹ 例如他曾自稱「究竟也頗熟于世故了」。魯迅，《華蓋集》，〈「碰壁」之後〉(1925)，頁70。

⁴⁰ 葉適：「幹敏強力，老練世故，審動而果，慮遠而成。」葉適，《水心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卷22，〈故大宗丞兼權度支郎官高公墓誌銘〉，頁13b。

⁴¹ 鄭學稼，《魯迅正傳》，頁37。

學院特約撰述員」名義領國民政府的錢，四年間計得一萬四千四百元。⁴² 又在行文中說：「深於世故、並熟悉政治生活的魯迅，所有言行，都經過一番考慮。」⁴³ 意思是魯迅老謀深算，委蛇兩端，雖居公義之名卻佔盡實利。

楊澤稱魯迅為「世故的中年人」，但卻賦予正面意涵。三十七歲這年（1918）他寫下〈狂人日記〉、〈我之節烈觀〉、〈隨感錄〉，算是「已屆中年」才逢上新文學革命的浪潮。中年經常意味著喪失青年的銳氣與火氣，魯迅卻反而越趨強旺。楊澤指出：

到後來自北京出走，更直接地和全中國世故老成的上一代為敵。終其一生，魯迅峻拒與傳統的人情世故周旋，反而選擇向保有天真的年輕人說話，說傳統文化、文人的「壞」話。⁴⁴

中年的慣性是城府加深，人情練達，發為文章便是圓融、淡靜而吞吐。楊澤以為，魯迅偏偏逆反於這些慣性，「一點也沒有染上傳統文人的故態、老態」。⁴⁵ 他熟諳舊社會的套路，反戈一擊，更能直中要害。依照此說，魯迅雖懂世故但卻是最不世故的，正與鄭學稼所見相反。

當長虹譏魯迅為世故之際，魯迅諧仿其論說方式，自嘲兼反諷此種投機青年亦屬「新的世故」。⁴⁶ 這時，他已認識世故的歧義；到了晚年，更直接揭示「世故三昧」：

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深於世故」也不是好話。「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樣，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據我的經驗，得到「深於世故」的惡謚者，卻還是因為「不通世故」的緣故。⁴⁷

⁴² 同前引，頁 564。

⁴³ 同前引，頁 379。

⁴⁴ 楊澤，《魯迅散文選》（臺北：洪範書店，1996），〈恨世者魯迅〉，序頁 5。

⁴⁵ 同前引，序頁 7。

⁴⁶ 魯迅，《魯迅三十年集補遺》，〈新的世故〉（1926），頁 54-66。

⁴⁷ 魯迅，《南腔北調集》，〈世故三昧〉（1933），頁 179。

在後文裡，他還以反諷之辭勸告青年：見不平事別說公道話，否則事情就轉到你身上了。見人以謠言相欺亦莫點破，否則就會壞人興致而招眾怒。以上是「處世法的精義」。明明處於惡劣之世，但大家都不開口或者以為和自己不相干，這才是「處世法的精義中的精義」。世故一語，纏繞魯迅多年，此文具有徹底加以清理的意義。綜合看來，全文隱含許多訊息：首先，他運用了辯證思維，指陳了世故的雙義。其次，自己之「不通世故」是本是因，被稱為「深於世故」則是後果。其三，世俗以為，順眾欺瞞即是深於世故，逆眾揭破即是不通世故。其四，世故是集體病徵，重點在社會的狀態，不應用以責個人。

魯迅文中的說話主體，確實常以「過來人」的姿態（非但頗識青年心理，還深知中年三昧），展示出一種洞澈。前期文章稍迅猛，後期文章則褻積愈深。試舉〈朋友〉（1934）一文為例，先是陳述小學看小戲法、中學看大戲法、後來看電影等三次經驗，歸結出：不明就裡則興味盎然，知其奧妙便索然無味了。因此，暴露隱秘的人，不但為變戲法者所深惡亦且為觀眾所深惡。⁴⁸——這種講法，幾乎等同於前文所說的「世故三昧」。他以個人體驗為基礎，歸納出世故（但不肯安於其中），演示其深意，再加以揭破。他若非「深於世故」，也就無法看透這許多曲折的把戲；若非「不通世故」，也就不能猛然加以說穿。

「說穿」需要勇氣，「看透」則需要智慧。他早年主張摩羅詩學，講究逆天抗俗的意志；在五四時期，則鼓舞青年要「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⁴⁹但隨著年歲推移，他體驗到舊社會的把戲比想像中更為繁瑣，「看透」乃是「說穿」的必要前提。因此，從〈狂人日記〉、〈阿 Q 正傳〉等初期名作裡，我們便可看到，他兼具「摩羅詩人」與「世故老人」的雙重主體。後期的雜文創作，更是以抗世逆俗為底蘊，而以勘破世情為憑藉。其敘說程式大略如下：社會通例如何，其實底蘊如何；但因人性如何，恐怕應當如何。中年以後，他不甚採用直接說破的方法，而多曲折其言，好用反諷、諧仿與弔詭，對於中國世情採取潛入式的揭發。彷彿浸染於市井，摸透了底細，這使得他的論說充滿「局內人」的親體實歷，而坐實了「世故」的稱號。

馮雪峰曾說：「魯迅，確實非常熱情，然而又確實有些所謂冷得可怕的呵。」⁵⁰魯迅始終保有一顆「摩羅的心」，那是熱的；但也因而練就一種「世故之眼」，那

⁴⁸ 魯迅，《花邊文學》，〈朋友〉，頁 45。

⁴⁹ 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五）〉，頁 44。

⁵⁰ 馮雪峰，《回憶魯迅》（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頁 6。

是冷的；冷熱交相為用，是他極為重要的特質。熱是本質，冷是他防衛與攻擊的工具。形成這種性格的原因非僅一端，而被浪子們背叛或倒打一耙的豐富經驗宜為關鍵。許廣平曾列舉諸多例證，說明魯迅甘於被青年欺瞞利用，在世俗看來簡直「愚不可及」，哪裡是「老於『世故』」？⁵¹ 事實上，如將關注點從「世故」這個概念轉到「老於」這個狀態，那麼魯迅確實是安之無愧的。「老於……」是熟習與洞察，一種高密度的經驗值與延展力。對於三千年傳統的深入知解，再加上大家族興衰的見聞，以及後來熱戰冷鬥的密集體驗，使他提早地「老於」諸多人事物，從而構成一種獨特的觀世方法與寫作資源。

(四)「老而愈辣」的後期風格

魯迅生命中的最後幾年，雜文產量頗富，一方面固然顯現他對那種匕首投槍式的文體已經操之甚熟了，另一方面也顯現他至老還糾葛在那無止無盡的筆墨戰場裡，探索那些政治、社會、文化種種病灶。但依照傳記資料，我們知道，這幾年的魯迅卻是時常遭受到「病死」和「橫死」的威脅。老年的他即便「心力交瘁」，仍然「盛怒疾言」；既不歎老傷病，亦不空言崇高的悟境。風格發展基本上跳脫了「老而淡」的傳統典型，而走向「老而辣」的特殊模式。

魯迅的雜文，自始即以潑辣帶刺為基調。西滢（陳源，1896-1970）稱周氏兄弟皆有「刑名師爺的脾氣」，魯迅還是「做了十幾年官的」。⁵² 事實上，二周對於自身的「浙東性」皆頗為自覺，甚至刻意加以發展；而其內涵則頗為豐富多姿，非僅紹興師爺的剷刻與機鋒而已。晚年魯迅愛引王思任語：「會稽乃報讎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污之地！」並以「女弔」這種深具「復讎性」的故鄉鬼物來加以驗證。⁵³ 魯迅擁有一套「怨恨」哲學，那是愛的另一種形式（而非對反），可以更為深入地認識並回應世界。他一生以戰為論，飽受圍剿，因而怨恨乃愈堆愈高，其「復讎性」的筆法也隨之加深。在死前論死，他曾戲擬遺囑以示親屬，其中有云：

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⁵⁴

⁵¹ 許廣平，《欣慰的紀念》（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頁68。

⁵² 西滢，〈閑話的閑話之閑話引出來的幾封信〉之九〈西滢致志摩〉，《晨報副刊》（北京），1926年1月30日，頁58-60。

⁵³ 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女弔〉（1936），頁157。

⁵⁴ 同前引，〈死〉（1936），頁155。

由此看來，晚年魯迅並不循著中華文化的慣例，老而歸於沖淡、圓融與超脫，反而變本加厲，持續發展他自〈摩羅詩力說〉以來的衝突美學。

魯迅至老不與世界「和解」，並保有強旺的「攻擊性」。關於這種晚期形象，在他既死之後，舊友林語堂 (1895-1976) 曾經有一段頗具形象性且直契精神核心的描述：

魯迅誠老而愈辣，而吾則向慕儒家之明性達理，魯迅黨見愈深，我愈不知黨見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魯迅所持非丈二長矛，亦非青龍大刀，乃煉鋼寶劍，名宇宙鋒。是劍也，斬石如棉，其鋒不挫，刺人殺狗，骨骼盡解。於是魯迅把玩不釋，以為嬉樂，東砍西創，情不自已，與紹興學童得一把洋刀戲刻書案情形，正復相同。……於是魯迅復飲，俄而額筋浮脹，睚眦欲裂，鬚髮盡豎；靈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鬚更豎，乃磨硯濡毫，呵的一聲狂笑，復持寶劍，以刺世人。火發不已，嘆興不已，於是魯迅腸傷，胃傷，肝傷，肺傷，血管傷，而魯迅不起，嗚呼，魯迅以是不起。⁵⁵

以「辣」的概念，總括魯迅性格與文風，宜為時人共見。林語堂稱「老而愈辣」，則進一步認定魯迅的「辣」在後期續有發展，甚至有與「老」相融之勢。接下來他以「持劍」東砍西創的形象，來描述魯迅的好鬥嗜爭——在精神上並無衰憊之態，反而忽忽如狂。他又用頑劣的「紹興學童」來形容這位「世故老人」，微有譏嘲之意（畢竟林氏本人以閒適為尚，並以「明性達理」自居），卻也凸顯了魯迅性格的複合結構。驗諸魯迅最後幾年的雜文寫作，我們認為，老練的林語堂所見比進步青年們更深刻些。特別是關於「傷」的描寫，充滿疼痛的身體感。所謂「欲傷人必先自傷」，衰弱老病而仍戀戰好鬥的肉身，同時飽含社會性與抒情性。那是主體把自己從麻木裡搶救回來的一種方式，也是回應惡俗世界不得不然的代價。

不過，林語堂認為魯迅晚年好戰係基於性格，沒有可信服人的理念，有則為左的「黨見」而已，這恐怕還是低估了魯迅的意義。在生命中的最後幾年，魯迅面對的挑戰是多重的；除了感時憂國的惡劣心境之外，尚包含下列數端：其一是來自八方的叫罵與筆戰，其二是國民政府日趨高壓的統制，其三是病。魯迅老早就認識到「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絕不像詩人想像的那般有趣，這般完

⁵⁵ 林語堂，〈悼魯迅〉，《宇宙風》，32（上海：1937），頁394-395。

美」。⁵⁶ 左翼陣營雖給他送上「紙糊的高帽」，但卑瑣的政治動作並未斷絕；右翼當權者則反覆施以威迫，或放出逮捕的訊息，或禁制其文章之刊布。1931年，柔石（1902-1931）、白莽（1909-1931）等青年被捕並遇害，魯迅的悲憤至極。1933年，「民盟」成立，未久楊杏佛（1893-1933）被殺，那種橫死的壓力更趨於具體。因此，魯迅之持「宇宙鋒」力戰不休，絕非「以為嬉樂」，而有極豐厚的現實緣由與內在情感。

由於審查機制日益嚴峻，為了避免雜誌一出刊即遭禁，魯迅乃游離於各種筆名之間，取得了暫時的「匿名性」。⁵⁷ 這種情境一則使他必須在筆調上略事隱藏，一則使他在內涵上更猛於諷刺，形成曲折拗峭的特殊風格。除此之外，1934年前後的「雜文與小品文」論爭，雖線頭紛繁而皆以魯迅文章為爭議要點。魯迅即在這種亂局中，確立了「雜」的文章理念。首先，這種文章重視「編年」超過於「分類」，那也就是在同一年裡依照「時勢」發展，採用各種多變雜選的文體來寫作。其次，看重即時性，把文字視為身心介入的延伸，因為「作者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⁵⁸ 其三，則是充滿戰鬥性而使閒適者讀之不快的內容，那也就是主於「鹹」、「辣」、「毒」的審美傾向。

事實上，晚年魯迅的寫作除了為革命服務之外，也頗有重新建構主體的意義。除了表面層次的亂鬥之外，他的雜文仍在深層裡繼續從事「反抗絕望」的行動。他有反覆迎戰的壓力，同時還要面對內在於己的「病」和「死」和「老」。下面這則致臺靜農（1902-1990）的信札，可略見其晚年心境：

我鑒於世故，本擬少管閒事，專事翻譯，藉以糊口，故本年作文殊不多，繼嬰大痛，稿臥數月，而以前以畏禍隱去之小醜，竟乘風潮，相率出現，乘我危難，大肆攻擊，于是倚枕，稍稍報以數鞭，此輩雖猥劣，然實于人心有害。⁵⁹

寫給親密門生的書信，更能在公共話語之外，透顯其「私」的面貌。這類晚年文字

⁵⁶ 魯迅，《二心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1930），頁49。

⁵⁷ 有關國民政府統制下，上海的文禁與魯迅之使用化名，詳散木，《于無聲處聽驚雷——魯迅與文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頁101。

⁵⁸ 魯迅，《且介亭雜文》，〈序言〉（1935），頁7-8。

⁵⁹ 魯迅，《魯迅書簡I》，〈致臺靜農〉（1936.10.15），頁139。

與報刊雜文相比，更加古奧深邃。雖簡筆勾勒且故做淡定，其實滿溢著對時局的悲憤。同時，這裡也反映出他在三種威脅（大病，當局的熱槍，文壇的冷箭）之下，猶然倚枕作戰的情態。——這些質量俱可觀的書札，更為自在地展布心志，因此抒情性大於戰鬥性。他使用了近於「文」而遠於「白」的語言，形成一種簡練、剝落、瘦勁的文體，雖然在古雅之餘仍飽含著不馴的氣格。

魯迅最後幾年，明顯具有衰退、疲勞、遲重的身體覺知，以及在絕望中掙扎奮起的心緒。雜文體式除了刺世棘口之外，本自具有章法自由、內容駁離、文字恣放的性質。這種「雜」的文體傾向，在《且介亭雜文》三集裡，彷彿與「老」的主體狀態微妙地融合。在〈病後雜談〉、〈病後雜談之餘〉這類長篇雜文裡（1934），掌故、世局、身邊瑣事與感慨被隨意地嫁接，卻能產生奇妙的律動感。血氣衰弱，時局混亂，友人勸他出國避難兼養病，魯迅答以「輕傷不下火線！」⁶⁰「老」而任性、不安，充滿否定性與戰鬥性，那便是魯迅所樹立的新的晚年典型。

三、周作人與「老」

（一）從反抗到「順其自然」

在破舊立新的時代裡，周作人不僅積極參與風潮，更常為先驅。早年在故鄉任教，對於徵集兒童作品的課題，他即有「要當以兒童為師而自求之」，「保存本真，以兒童為本位」的講法。⁶¹到了五四時期，他又通過縣密的論證，主張「我們不可不廢去祖先崇拜，改為自己崇拜——子孫崇拜。」⁶²依照五四啟蒙方案，拋棄過去、迎向未來乃是諸多變革的前提。而祖先崇拜將使人固著於傳統事物，故亟須加以破除。

兒童與老人不僅為議題，更是內在於己的兩種主體狀態。論者指出：「周作人的『兒童心態』還是一個不常有人道破的祕密；但他的『老人心態』則是顯而易見

⁶⁰ 茅盾，〈魯迅說：「輕傷不下火線！」〉（1976），收入本社編，《魯迅回憶錄》（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78），頁3-6。

⁶¹ 陳子善、張鐵榮編，《周作人集外文》（海口：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5），〈學校成績展覽會意見書〉（1914），頁175。

⁶² 仲密（周作人），〈祖先崇拜〉，《每週評論》，10（北京：1919），第3版。早於前引胡適的〈我的兒子〉。亦見周作人，《談虎集（上卷）》（上海：北新書局，1929），頁4。

的。」⁶³ 他一生倡導「女人與小兒的發見」，致力傳播進步開明的理念；⁶⁴ 同時又常在筆下再現小孩的目光、心思與口吻，嚮往天真爛漫之境。事實上，這種情懷在學術史上不算「祕密」，但如何與老人心態並存互證，卻是極有意義的議題。

如能深入考掘「老」的概念，當知它在周作人身上遠比兒童心態更為複雜。首先，崇幼為五四前後的主流，尚老則顯得逆時而忤世，牽涉更多的傳統資源。其次，兒童心態較為一致，老的概念則包含的層次更廣，內在矛盾亦較多。其三，「老」在周作人不同時期的思維結構裡，經歷了較為繁複的演變。——我們談老的時候，必然也糾結了幼與壯的課題，涉及傳統與現代的變遷，文人層與民間層的對比，因而也格外具有融攝的意義。

周作人五四時期的言行都較為銳進，具有顯著的社會關懷。對於五卅運動 (1925)、女師大三一八慘案 (1926)，以及肅殺的剿共行動 (1927)，他都曾經為文批判當局。這種爭自由的意識常與「反老人」的論述聯結起來，例如作於四十三歲的這篇「雜感」：

東方是奉行老人政治的。……近來，這似乎已改良不少，五六十歲就大有柄政的希望。只要少無病呻吟，不衝上前去，免於二次三次的清黨之難，再活二十年是不很難的。到那時，那是我們的天下了。到那時，放屁放屁，真真豈有此理，要怎麼說就怎麼說，要怎麼幹就怎麼幹，豈不懿歟！⁶⁵

話裡的牢騷是很顯著的，他諷刺「老人」享有暴行與胡說的自由，至於青年人「最好」不要躁動，苟活以待老，屆時自然可以掌握權勢了。——看來已入中年的周作人，仍然站在老年的對立面，充滿戰鬥氣息的。實際上，四十歲出頭到底更靠近青年或老人，並不全然是生理事實，而涉及主觀的價值選擇與形象詮釋。我們記得，長虹稍早的罵文 (1926)，即把周氏兄弟一起歸入「世故老人」的行列。

事實上，寫〈老人政治〉的這一年 (1928) 正是他逐漸轉入「消沉」、收斂「凌厲」的重要轉捩點。他發表「閉戶讀書論」，直言要「苟全性命於亂世」。稍後經歷喪女之痛 (1929)，心緒更趨索漠，隔年即發表〈中年〉一文：

⁶³ 劉緒源，《解讀周作人》（臺北：秀威資訊，2009），頁 194。

⁶⁴ 楊牧，《失去的樂土》（臺北：洪範書店，2002），〈周作人論〉（1983），頁 374。

⁶⁵ 北斗（周作人），〈老人政治〉，《語絲》，4.41（上海：1928），頁 42。

少年時代是浪漫的，中年是理智的時代，到了老年差不多可以說是待死堂的生活罷。然而中國凡事是顛倒錯亂的，往往少年老成，擺出道學家超人志士的模樣，中年以來重新來秋冬行春令，大講其戀愛等等，這樣跟著青年跑，或者可以免於落伍之譏，實在猶如將晝作夜，「拽直照原」，只落得不見日光而見月亮，未始沒有好些危險。我想最好還是順其自然……，即使在市街戰鬥或示威運動的隊伍裏少了一個人，實在有益無損，因為後起的青年自然會去補充。⁶⁶

話雖說得通達，但這其實算是一篇退出示威行列的宣言。所持理由是「順其自然」：少年應熱烈，而 he 已戰鬥過了；中年宜靜退，而他已到這時候了。其中儼然預設一種「生命階段發展論」，恐怕還是掉進了一種講究「得體」的傳統文化思維裡，雖然 he 自認為轉移了其內容（變「不自然」為「自然」）。此外，這裡暗地用了一種簡單的二分化：把「少年—青年」合併起來，談到「老年」則以「待死」輕輕帶過，實則是把「中年—老年」連成一體。我們甚至可以說，他所自述的「中年」根本提前進入一種「老年」狀態。此後隨著年歲遞增，他便罕談中年，而直接以老年來涵蓋或代替中年了。

前面這篇文章，還包含一種觀點：青年對英雄的浪漫崇拜，其實近乎盲目。實際上，周作人不僅在為自己的退離的人生觀（以及沖淡的文章觀）提出解釋，更寓有批評之意。例如提及有中年人「秋冬行春令，大講其戀愛」，依照學者的看法，便是在譏刺魯迅與徐廣平的情事。⁶⁷當然，這裡只舉秋冬之戀為例，卻也暗射其政治關懷同樣是「跟著青年跑」而已。〈老人的胡鬧〉雖是在談論日本時政，卻也步步指向本國：

陽曲傅青主有一條筆記云：「老人與少時心情絕不相同，除了讀書靜坐如何過得日子。極如此是暮氣，然隨緣隨盡，聽其自然。若勉強向世味上濃一番，恐添一層罪過。」只可惜老人不大能遵守，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興佔勢力的意見，不問新舊左右，輒靡然從之，此正病在私欲深，世味濃，貪戀前途之故也。……這裏可注意的是，老人的

⁶⁶ 周作人，《看雲集》（上海：開明書店，1932），〈中年〉（1930），頁 100-101。

⁶⁷ 舒蕪，《周作人的是非功過》（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周作人對魯迅的影射攻擊〉，頁 417-420。

胡鬧並不一定是在守舊，實在卻是在維新。蓋老不安分重在投機趨時，不管所擁戴的是新舊左右，若只因新興有勢力而擁戴之，則等是投機趨時，一樣的可笑。⁶⁸

他既把中、老年之退離，視為「安分」；便把老人之多所作為，視為「逾矩」了。從前他攻擊老人的「守舊」，臨老則常把別的老人之激進（暗指魯迅）視為一種「投機趨時」。——這裡我們看到，周氏兄弟老人觀的差異（亦即對於老年自我的不同定位）：周作人認定「老而淡」是至理，陷於「暮氣」而不辭；魯迅則往「老而辣」的方向發展，決然與「衰憊」相搏鬥。

周作人還把上述思維，運用到文藝審美的範疇。稍早在〈談文〉一文裡，他曾引述「少年愛綺麗，壯年愛豪放，中年愛簡練，老年愛淡遠」之說。⁶⁹ 中年以後，更愛這種對應式的「審美年歲論」：

中國人向來尊重老成，如非過了中年不敢輕言著作……所以除了有些個性特別強的人，又是特別在詩詞中，還留在若干綺麗豪放的以外，平常文章幾乎無不是中年老年即上文所云後期的產物，也有真的，自然也有仿製的。……那時候叫青年人讀書，便是強迫他們磨滅了純真的本性，慢慢人為地造成一種近似老年的心境，使能接受文學的遺產。……少年中年老年，各有他的時代，各有他的內容，不可互相侵犯，也不可顛倒錯亂。最好的辦法還是順其自然，各得其所。⁷⁰

他發現，由於「簡練—淡遠」所構成的後期風格，籠罩著傳統文學的寫作。即便是青年人也被社會教養提前趕進這種範式裡，抹滅了「純真」，這是「人為地」提早進入老境，故為他所反對。反過來說，人到中年以後，文章進入「老成」，便屬於「順其自然」，合理且合情。依此推演，若有文人後期文章仍綺麗或豪放，或者像魯迅那樣老來竟仍憤憤不平的，也就被他視為「顛倒錯亂」了。

所謂老少之境「不可互相侵犯」，不無刻意簡化風格問題之嫌。「老境」未必歸於「淡遠」，周作人的創作實踐也沒那麼簡單。事實上，不僅風格樣貌是選擇的

⁶⁸ 周作人，《瓜豆集》（上海：宇宙風社，1937），〈老人的胡鬧〉（1936），頁278-279。

⁶⁹ 周作人，《苦竹雜記》（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6），〈談文〉（1935），頁289。

⁷⁰ 同前引，頁290-291。

結果，將自我定位於青壯中老的哪一點亦非客觀。以他本人而言，大約四十歲以後，便主動凝結在「苦雨齋老人」的形象裡了。這在行動上是「退縮」，在思想上仍有進境。此後數十年，他就以頗具層次感與戲劇性的方式，融貫傳統概念，同時擴充了「老」的美學、倫理與思維。

(二) 苦味與憂患之思

如眾所知，周作人在「沖淡平和」的風格之外，另有一種「浮躁凌厲」的筆調。但與其說周作人的文體由「凌厲」向「沖淡」發展，毋寧說是兩體並存，惟組合樣式與比例成分隨年歲而有所輕重。在四十歲這年，他說：

我近來作文極慕平淡自然的境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國文學纔有此種作品，自己還夢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為這有氣質境地與年齡的關係，不可勉強，像我這樣褊急的脾氣的人，生在中國這個時代，實在難望能夠從容鎮靜地做出平和沖淡的文章來。我只希望，祈禱，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蕪下去，這就是我的大願望。⁷¹

言下之意殆謂，新文學頗欠缺「平淡自然」一格；他所接受的域外與古代資源，卻提示著此種境地之深邃可貴。雖然時代現實使人無法鎮靜，但他仍在等待或追求。

問題是，如果「褊急」才是他天生的氣質，「平淡」又豈是出於自然？在同一篇文章裡，他自謂：

越中風土的影響大約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東性，這就是世人所通稱的「師爺氣」。……檢閱舊作，滿口柴胡，殊少敦厚溫和之氣；嗚呼，我其終為「師爺派」矣乎？……我有志為京兆人，而自然乃不容我不為浙人，則我亦隨便而已耳。⁷²

「褊急的脾氣」加上這裡所說浙東人特有的苛刻凌厲之氣，這才是他的「自然」。至於「有志為」京兆人，那種京派風格卻是後天經營出來的。中年以後刻意「沖淡」，便是藉由閱歷、心境、修為的變化，趁勢壓抑這種原本不可拔除的血氣之自

⁷¹ 周作人，《雨天的書》（上海：北新書局，1933），〈自序二〉（1925），序頁6。

⁷² 同前引，序頁5-6。

然（天性褊急），並選擇性地發揮另一種年歲之自然（老而沖淡）。

如前節所論，「浙東性」其實指涉多層，各人所見，未盡相同。稍早，周作人即指出：

近來三百年的文藝界裏可以看出有兩種潮流，雖然別處也有，總是以浙江為最明顯，我們姑且稱作飄逸與深刻。第一種如名士清談，莊諧雜出，或清麗，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覺可喜。第二種如老吏斷獄，下筆辛辣，其特色不在詞華，在其著眼的洞澈與措語的犀利。⁷³

他向來強調「明末」的文章變化，這裡則還強調「兩種潮流」與浙江風土的關聯性。當然，我們不能簡單地把此文所說的「飄逸—深刻」拿來分別對應於「沖淡—浮躁」的風格，甚或分別派歸於周作人和魯迅。因為「名士清談」與「老吏斷獄」這兩種方法，雖似相反，卻也可以兼用。問題只在於一家、一集、一篇之中，何者居於主導而已。所謂「老吏斷獄，下筆辛辣」，其實算是一種特殊的「老格」——因為識多、慮深、熟極，所以狠毒、痛快、準確。事實上，這種筆法在周作人的文章裡並未消失，只是隱伏不露，或出之以「外沖淡而內凌厲」的模式。

要闡釋「平淡自然」的美學，須先把握他刻意經營的「苦雨情境」。直截的解釋與描述，備見於〈苦雨〉（1924）一篇。⁷⁴ 惟依其說，則這一整本書都可以算是苦雨的產物。因此，更早寫成的〈自序一〉（1923），即指出：

今年冬天特別的多雨，因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傾盆的下，只是蜘蛛絲似的一縷縷的洒下來。雨雖然細得望去都看不見，天色卻非常陰沉，使人十分氣悶。在這樣的時候，常引起一種空想，覺得如在江村小屋裏，靠玻璃窗，烘著白炭火鉢，喝清茶，同友人談閑話，那是頗愉快的事。不過這些空想當然沒有實現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覺得陰沉。想要做點正經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氣的燒酒，一點味道都沒有，只好隨便寫一兩行，並無別的意思，聊以對付這兩天的氣悶光陰罷了。⁷⁵

⁷³ 周作人，《談龍集》（上海：開明書店，1927），〈地方與文藝〉（1923），頁12-13。

⁷⁴ 周作人，《雨天的書》，〈苦雨〉，頁1-6。

⁷⁵ 同前引，〈自序一〉，序頁1-2。

表面看來，也就是苦於淫雨擾人而已。惟天氣的「陰沉」和心裡的「氣悶」反覆連結，交互投射，則又隱隱然指向時局或世況。⁷⁶ 中間一段貌似隨意的「空想」，無論就語法或情境而言，恐怕都轉化自廚川白村 (1880-1923) 的話：「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爐邊的安樂椅子上。倘在夏天，則披浴衣，啜苦茗，隨隨便便，和好友任心閑話，將這些話照樣地移在紙上的東西，就是 Essay。」⁷⁷ 懷想不遂，愈添苦惱，周作人在這裡暗示著：自己雖嚮往閒適之境，卻滿懷憂患之心。

所謂「苦雨齋老人」，做為一種自我形塑的意象，戲劇化地聯結了「苦」的審美趣味與「老」的主體狀態。周作人筆下的「苦論」，約有三種用法：早先是苦於某事某物，即作為動詞的「憂也，患也」，如苦雨；然後才是某事某物之苦，即作為形容詞或名詞的「苦味」，如苦茶、苦竹、苦口。如再連繫到佛家所謂「苦」諦，取義更為深遠。——事實上，周作人既著力追求「自然」、「平和」、「沖淡」之境，卻又刻意標舉「苦」的美學，其實不無扞格之處。試想，假使甜味或辣味有違「自然」，苦味又怎能算是「沖淡」呢？

除了「苦」之外，與老境美學緊密相關的兩個美學概念是「冷」和「澀」。按「苦澀」合言，作為談詩論藝的術語，在中國由來已久。如釋皎然《詩式》說「詩有二要：要力全而不苦澀，要氣足而不怒張。」⁷⁸ 非但不尊崇苦澀，還以之為病。但在宋代，由於美學觀念的轉換，如「食橄欖」般的「苦」與「澀」之味，被拿來擬況一種特殊的詩味，並且奉為上品。在梅堯臣的理論架構裡，這種苦辭澀句，是可與平淡相融洽的。但朱子談平淡時，卻說：

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怪雕鏤，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澀，則見其淡耳。⁷⁹

在這一段文字裡，「苦澀」與其他幾種格調同被列入負面系列，同被視為「平淡」的對立面。由此看來，「苦—澀」與「平—淡」在不同的話語脈絡裡雖然各具指意，未必可以輕易牽合的。

⁷⁶ 按苦雨詩或愁霖賦，為魏晉以降常見的母題，經常描述積雲沉重、霖雨不散的陰鬱感，以及行路艱難、索居困窘的凝滯感。參見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 28-32。

⁷⁷ 廚川白村著，魯迅譯，《出了象牙之塔》（臺北：昭明出版社，2000），頁 115。

⁷⁸ 釋皎然，《詩式》（上海：商務印書館，1940），頁 2。

⁷⁹ 朱熹，《晦庵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 64，〈答鞏仲至〉，頁 5。

周作人談論絮語散文，主張：「必須有澀味與簡單味，這纔耐讀。」⁸⁰ 主要是從「文詞」上立說，而歸之於「知識」與「趣味」。後來又稱俞平伯、廢名一路的風格「澀如青果」，⁸¹ 則有更為強烈的美學意涵，兼亦可見自許之意。依照卜立德的闡釋，所謂「澀」乃是「對諸如與平滑相對的粗礪、與明晰相對的晦澀、與直說相對的含蓄以及與濃厚相對的枯瘦的偏愛」，⁸² 總之，它涉及一種創造性的阻扼感。郁達夫便稱他：「近幾年來，一變而為枯澀蒼老，爐火純青，歸入古雅遒勁的一途了」。⁸³ 我們看到「苦澀」品味與「蒼老」境界的連繫，這在文言詩詞裡或非罕見，但以白話為文而能達成此境則是周作人的功績。

五十歲壽辰之際，周作人寫下兩首詩自述其志。僅舉其一：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

老去無端玩骨董，閒來隨分種胡麻。旁人若問其中意，請到寒齋吃苦茶。⁸⁴

詩裡流露出沉隱於書房的出世抉擇，他已退出「十字街頭」，並刻意把自己安排在「塔」內靜觀。在他看來，那些革命奮進的口號無異「談鬼」，終歸虛無；而自己出入於中外古今的駁雜文章雖類「畫蛇」，差堪自慰。五四時代的文化鬥士，不過二十年間已覺「老去」，走入了自己批評過的「玩骨董」（讀古書，尋古趣）的道路。「胡麻」或指域外傳來的瑣細事物（書與趣），他自稱隨緣栽培，其實也暗含著把關懷從「救亡」轉到「啟蒙」之意。在看似隨便的賦詠裡，雖不至於「寄沉痛於幽閑」，但亦別有所託。

這首詩被林語堂拿去刊登在《人間世》，和者既眾，譏者亦多。有熱血青年諷刺他：「誤盡蒼生欲誰責，清淡娓娓一杯茶」，「不趕熱場孤似鶴，自甘涼血冷如蛇」。⁸⁵ 這雖只是一場無關宏旨的文字風波，但周作人冷、清、淡、苦的「老

⁸⁰ 周作人，《永日集》（上海：北新書店，1929），〈燕知草跋〉（1928），頁83。

⁸¹ 周作人，〈志摩紀念〉，《新月》，4.1（上海：1932），頁215。

⁸² 卜立德 (David Edward Pollard) 著，陳廣宏譯，《一個中國人的文學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頁119。

⁸³ 郁達夫編，《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導言〉，序頁14。

⁸⁴ 周作人，〈偶作打油詩兩首〉，《人間世》，1（上海：1934），頁4。

⁸⁵ 李景彬、邱夢英著，《周作人評傳》（重慶：重慶出版社，1996），頁202。

人」形象，便就此深植於人心了。由此看來，他雖曾參與反傳統的文化戰鬥，但經歷中年的轉折，他不再把「老人」等同於落伍，甚至不將「守舊」視為壞事。由「苦雨」的憂患之思，到「苦茶」的淡默自甘，恰好經歷十年的發展。前者尚在中年，只是提早孺慕老的境界；後者則已就位於老的主體狀態，心緒更加澄定。

(三)老退，忍辱與全生

五十歲 (1935) 以後的周作人，著力於發展一種老退者的哲學。他一方面盤整「苦」的論述，以苦茶、苦竹、苦口甘心自相標舉；一方面安居於文化思想家的位置，提出冷、靜、忍辱等概念。這時面對日本的武力威嚇，中國社會正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文化界的主流意見，乃是團結、犧牲與奮進。周作人卻認為徒有熱血不足以改變大局，徒然殞身誤國而已，乃自覺地扮演著一種冷卻劑的功能。他選擇留在北平與敵人合作，固與外在情勢相關，但亦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與心理基礎。

他在淪陷期的論述，大多可以從戰前找到端倪，只是發展得更為深入完整。在《苦茶隨筆》的序言中，他縱談儒釋道三派對「忍」的說法，並寄心於杜牧所謂「忍過事堪喜」一語：

我不是尊奉牠作格言，我是賞識牠的境界。這有如喫苦茶。苦茶並不是好喫的，平常的茶小孩也要到十幾歲纔肯喝，嚥一口齏茶覺得爽快，這是大人的可憐處，人生的「苦甜」，如古希臘女詩人之稱戀愛，詩云，誰謂茶苦，其甘如薺。這句老話來得恰好。⁸⁶

這段話儼然是以「忍—喜」對應於「苦—甘」，並歸結到「苦茶」的形象。他又用能否品茶來區別「小孩／大人」，言下之意殆謂，「忍」和「苦」乃是更深刻而成熟的「境界」，涉及心智與閱歷，越老而越能體會。又《詩·谷風》云：「誰謂茶苦，其甘如薺。」⁸⁷ 也是周作人所常引用的。茶為苦菜，薺為甜菜，依照鄭玄的闡釋：「茶誠苦矣，而君子於己之苦毒，又甚於茶。比方之茶，則甘於薺。」⁸⁸ 此心懷憂甚苦，相較之下，遂覺苦菜若甘。也就是說，重點不在外物之苦，而在內心之苦。他以「忍」詮釋「苦」，便形成一種特殊的審美旨趣。

⁸⁶ 周作人，《苦茶隨筆》（上海：北新書局，1935），〈小引〉（1935），序頁5。

⁸⁷ 毛亨傳，鄭玄箋，《毛詩鄭箋》，卷2，頁9。

⁸⁸ 同前引。

又如寫於戰前的〈家之上下四方論〉(1936)，含有較豐富的家庭論述與老人觀。其中所謂：「現代的兒子對我們殊可不必再盡孝」，「父母養育子女實止是自然之債」，⁸⁹ 大抵延續了五四時期的老幼換位的思維。新出特異之處，還在於論及老年應如何自處。他引述清人曹廷棟 (1699-1785) 所著《老老恆言》的話：

世情世態，閱歷久看應爛熟，心衰面改，老更奚求。諺曰，求人不如求己。呼牛呼馬，亦可由人，毋少介意。少介意便生忿，忿便傷肝，於人何損，徒損乎己耳。⁹⁰

這時他已練就一種「以抄書為著述」的手段，藉由「讀書隨感」來傳達自己的理念。他認為，父母可與子孫建立「老朋友」的關係，而前引老年達觀之論則為其前提。這裡我們看到，周作人的思維仍在「幼者本位」，要求「長者」有所抑斂謙退。蓋因他觀察時代發展，已微見老者漸居弱勢的事實；而老弱自全之道，便是清心寡慾而不多求。

中日戰爭時期，周作人成為淪陷區的文化樣板；甚乃「老而為吏」，出任教育總署督辦。這時寫的文章，大多無關於國事與時務，而重在倡導「疾虛妄」的理智精神。雖多舊說之延伸或重整，但思慮更趨於圓熟，常能從側面反應出個人的存在處境。其中有篇隨筆，即專談〈老老恆言〉(1940)，充分展示保身安命的老人思想。⁹¹ 按曹氏此書，作於七十四歲，乃是退隱閒居者的經驗談。周作人認為其言多通達事理，態度平和中正，極適合老人閱讀。——處於大戰之世，而暢談老者起居寢食自安之道；身在初老之年，乃提前進入一種養老的狀態。這種明哲保身的態度，便來自他一貫「冷靜」的思想。

事實上，在有「苦茶庵」之前，他已先建立了「知堂」的名號，高舉荀子所謂「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⁹² 提倡一種清明的知解，謹慎拿捏於說與不說，反對感情用事與非理性的狂飈。在一封私信裡，他表露了對文化鉅子的評議：

⁸⁹ 周作人，《瓜豆集》，〈家之上下四方論〉，頁 36-37。

⁹⁰ 同前引，頁 39。

⁹¹ 周作人，《藥味集》（北京：新民印書館，1942），〈老老恆言〉，頁 86-96。

⁹² 周作人，《知堂文集》（上海：天馬書店，1933），〈知堂說〉(1932)，頁 1。

觀蔡公近數年「言行」，深感到所謂晚節之不易保守，即如「魯」公之高升為普羅首領，近又聞將刊行情書集，則幾乎喪失理性矣。⁹³

在他的認知裡，「晚節」非關國族立場，而係指理智的主體位置，不雜染於時局世務。故如蔡元培之參與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魯迅之領導左盟、刊行《兩地書》，皆屬於熱過頭的行為。早先他即宣布「文學店」關門，轉而致力於思想觀念之廓清；蓋因文學常使人熱，思想則宜使人趨於冷靜。然則知也，苦也，冷也，在他而言乃是相互支撐的概念，而皆出自一個世味漸淡的老年主體。他反對「英雄崇拜」，倡導理智與和平，本是極正面的議論。然而，他決然走上與敵合作的不歸路，也與他自認為看透世局的「理智」判斷有關。

進入 1940 年代，他以「藥味」自我標舉，文雖「貌似閑適」，意在「有利於病」。⁹⁴ 其間頗有與時代「逆勢而說」的意思，傾向於驅逐激情，因此調性常是冷的。此意潛根入底，但亦曾直說不諱：

以上所說的話未免太冷一點，對於熱心的青年恐怕逆耳，不甚相宜亦未可知。但這在我是沒法子的事，……因為熱心青年熱心於文學，而我想勸止至少也是限制他們，這些話當然是不大嚥得下去的，題目曰苦口，即是這個意義。⁹⁵

這裡擺出「對青年說」的老年腔調。別人急於鼓動青年熱血，他則主張冷靜。所談雖僅文學，但也隱含著應對世局的態度。其下文引用《玉篇》所謂：「鼯，小鼠也，螫毒，食人及鳥獸皆不痛，今之甘口鼠也。」⁹⁶ 即暗指那些鼓動青年熱血的言論，似甘甜而實有害。至於他自己的「苦口」，則為有益的「藥味」。周作人的「老人言」，意在以「靜、退、冷」藥治他眼中熱昏頭的時代。——只是烽火正熾，國族危殆，此論也太不合時宜了。

此時，他雖處境艱難，思想仍有些進境。首先，他針對現代中國迫切的「心理建設」，發展兩個概念：一是「倫理自然化」，亦即在講倫理道德時，須多顧及人

⁹³ 周作人，〈致江紹原〉（1933），收入張挺、江小惠編，《周作人早年佚簡箋注》（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頁 273。

⁹⁴ 周作人，《藥味集》，〈藥味集序〉（1942），序頁 2。

⁹⁵ 周作人，《苦口甘心》（上海：太平書局，1944），〈苦口甘心〉（1943），頁 4-5。

⁹⁶ 同前引，頁 5。

類的生物性質，莫做違情悖理的要求。人與禽獸同樣追求「生存的方法」，所異在於人類會講「生存的道德」（亦即個體求生存時，仍須顧及他人，相互合作以求周全）。但這種道德如果太苛，便會違反自然，形成一種迫害。周作人認為，「現在的中國人特別是青年最要緊的也是第一救出自己來，得救的人多起來了，隨後就有救別人的可能。」⁹⁷ 另一則是「道義事功化」，主張「以道義為宗旨，去求到功利上的實現，以名譽生命為資材，去博得國家人民的福利，此為知識階級最高之任務。」⁹⁸ 也就是說，道德必須能夠實際產生效益，方可成立；否則以身殉國換得忠義二字，於國於民都沒有好處。

前述言論，似乎在為自己的通敵行為巧辯。惟賴芳伶指出，這種重視實踐性的思維係經長久蘊釀，只是在中日戰爭的時間點上凝聚成形；而對「國家動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的關切，也早見端倪。⁹⁹ 易言之，周作人自五四以來，一貫從「人情自然」去談思想與道德，顧及飲食男女的生物性，重視「求生本能」甚於國族大義。以此為根源，乃有附日的行動，「和比戰難」的言論，以及戰爭期的思想發展。在戰前，他即反覆申說尚文（賢哲）輕武（英雄）的道理，常以文化交流與思想重建自任。在抗日與反日之外，發願走上獨立研究的第三種態度，雖然明知這條路很可能失敗。¹⁰⁰ 但在國事無可作為之際，身為老退者，也只能盡心於此了。

事實上，周作人重視「人之生活意志」，深受日本近代思潮（特別是白樺派的文學運動）的影響；對於日本傳統文化的「人情美」與崇尚自然的傾向，則終身孺慕。¹⁰¹ 然而面對軍國主義者窮兵黷武的事實，欲辯難言，他只能宣告「關掉日本研究店」，重新開啟儒家研究的路。他宣稱，從西洋得「知」，從日本領受「情」的影響，但在「意」的方面則純是中國的。¹⁰² 整個戰爭時期，他便新建一種「儒家」的立場，倡導以求生意志為根本的人生觀，與深具人文主義色彩的漢文學。¹⁰³

通觀五十歲以後的周作人，基於抗日必敗的估量，提早進入一種遺老的心態；

⁹⁷ 同前引，〈夢想之一〉（1944），頁 11。

⁹⁸ 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編》（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61），〈道義之事功化〉（1944），頁 80。

⁹⁹ 賴芳伶，〈儒而近墨：試論周作人〉，《東華人文學報》，11（花蓮：2007），頁 235-267。

¹⁰⁰ 周作人，《瓜豆集》，〈談日本文化書（其二）〉（1936），頁 85。

¹⁰¹ 鄭清茂，〈周作人的日本經驗〉，收入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文學組》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1989），頁 881-887。

¹⁰² 周作人，《苦口甘心》，〈我的雜學〉（1944），頁 94。

¹⁰³ 周作人，《藥堂雜文》（北京：新民印書館，1944），〈中國的思想問題〉（1942），頁 12。

安於忍辱，重在保身，惟仍用心於傳播開明思想以及重估傳統文化。他把富於實踐力、效益性、同情心的「禹稷之道」視為「儒之本色」；並謂儒家到底是懦弱的，這種理想乃讓給了墨者。¹⁰⁴——但他也承認自己的儒家思想「缺少一點熱和動」，¹⁰⁵這樣的老人心態自難有所作為，而只能落入「閉戶可也」的境地。所謂道義事功化與倫理自然化的說法，以及注重個體「求生意志」的傾向，似乎頗為通達；但他自己做的抉擇，卻未能符合多數中國人的利益。他的理想人格，雖是「儒而近墨」；但在立身行事上，卻是近於黃老了。

(四) 老年之書與晚年書寫

在後期散文裡，周作人有意識地寫作著「老年的書」。這是指一種適合老年人閱讀的智慧之書，通常搭配著沖淡的筆調。他說：

文字的世界總是青年的，然而世界不單只是文學，人生也不常是青年。我見文學青年成為大人，（此語如作第二義解亦任便。）主持事物，則其修養（或無修養）大率與舊人相差無幾，蓋現時沒有書給大人讀，正與日本相同，而舊人所讀過的書大抵亦不甚高明也。……我覺得我們所需要的雖然也是找出心的故鄉來的文學，卻未必是給與安心與信仰的，而是通達人情物理，能使人增益智慧，涵養性情的一種文章。¹⁰⁶

新文學運動的青年性格是很明顯的，這不單指實際作者，也指預設讀者。最初周作人曾批評舊文學被老人標準所範疇，這裡則轉換角度，暗地批評新文學執泥於「青年的」標準與偏嗜（應當就是偏向於激情的）。等到讀過這些書的青年變為大人（兼指為官），依然盲目躁動。至於他所謂「老年的書」則有以下特點：首先，這種書並非用來侷限讀者的思維，故不同於與禮教共生的老成範式。其次，舊文學裡常多「不講情理的東西」，他則希望加入現代觀點，使其達到「增益智慧，涵養性情」的啟發效用。

日本戰敗投降，周作人被捕，在獄中度過三年。獄中他分明是六十歲的老人，以竹枝詞之體，寫起「兒童」雜事詩，彷彿在回味著單純的「本心」。隨著國共內

¹⁰⁴ 同前引，〈漢文學的傳統〉（1940），頁2-3。

¹⁰⁵ 周作人，〈苦口甘心〉，〈我的雜學〉，頁94。

¹⁰⁶ 知堂（周作人），〈老年的書〉，《輿論週刊》，1.5（北京：1937），頁19。

戰日殷，周作人於 1949 年初保釋出獄，並於年底正式恢復寫作。在社會主義共和國裡，「周作人已無批判、改造價值」，幸而得以存身而續其筆墨生涯。¹⁰⁷除了翻譯與編選的工作之外，此時的書寫可以分為三種：一是發表於報刊的短篇隨筆。包含寫於建國初期的《飯後隨筆》，寫於雙百時期的《木片集》。二是以魯迅為主題的瑣憶文章，包含《魯迅的故家》、《魯迅的青年時代》、《魯迅小說中的人物》。三是個人自敘傳，即最後的著作《知堂回想錄》。

其中第一種，最能延續周作人數十年來的寫作體式，就連意念也常是舊的，惟略變裝而已。因應新時代的政治潮流，他調整筆調，專寫略帶知識性與趣味性的話題。或論舊戲之改良，或敘五四之掌故，或寫日常之瑣物。大多著力於破除迷信，以便切合社會主義的科學觀念。惟錢理群指出，這些隨筆其實不乏勉強之作，因為周作人跟新社會並無太多共同語言。明明無話可說，卻要不斷地寫，主要仍是為稻粱謀。¹⁰⁸例如「倫理自然化」的道理，在 1940 年代早已論說完備；其中一個理據，乃是中國古人常將自然現象「倫理化」（如以「烏鴉反哺」、「羔羊跪乳」之類）。共和國時期的動物隨筆，即多添例證，反覆陳述這個理據，而不再深入探索倫理的課題。¹⁰⁹小品文最重筆隨意走，張揚個性；但他以有罪之身，置身集體化社會，自難再現任心閒談的風采。

第二種，係應報刊之邀，重構魯迅早年生涯的瑣憶文字。這類文字符合當時的政治氛圍，出版最為順利，便於賺取稿費。眾所皆知，二周早已絕交；魯迅去世未久，周作人的追懷文字，亦強調專記「平淡無事的事實」，希望把他當「人」去看，不是當做「神」。¹¹⁰時移勢易，魯迅的著作已躍居為新朝「經典」，周作人只能屈居於「衍義」。即便如此，周作人在《魯迅的故家》裡，依然執守著以平常之眼去看凡人的立場。表面上，魯迅的戰士幽靈高於周作人的罪人殘軀；但共通的成長背景，卻使他們具有相同的表述權，以至於悄然頡頏。也就是說，周作人在憶魯文字中，不免偷渡了個體情味與思維，表彰了自己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位置。

至於第三種，則係應曹聚仁之邀而撰寫的回憶錄，發表於香港，最具知堂老人的本色。首先，「我」重新躍居於主位，更能展現個人感興，不同於前兩種隱伏名號的寫作狀態。其次，文字回到老練、曲折而拗峭的風格，不必再顧及大眾，因而

¹⁰⁷ 耿傳明，《周作人的最後 22 年》（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頁 192-193。

¹⁰⁸ 錢理群，《周作人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0），頁 539-540。

¹⁰⁹ 周作人，《飯後隨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蠹魚的變化〉，頁 93；周作人，《木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猩猩的故事〉，頁 94-95。

¹¹⁰ 周作人，《瓜豆集》，〈關於魯迅之二〉（1936），頁 230。

顧盼生姿，流露一種自珍自信。假如說《朝華夕拾》是魯迅的原型之書，那麼《知堂回想錄》或可視為周作人的總結之書。當然，書中不無雜抄舊作的章節，或多舊意見之統整；然而經過老人心眼的新詮或補敘，每能添加一種論定的意旨。

即便只是回憶故鄉，亦可見二周相角的痕跡。以百草園為例，在魯迅筆下頗具幻妙的色彩；周作人則稱「……實在只是普通的菜園」，「……但百草園卻是沒有的」，「……這個我沒見過」，以糾舉魯迅所記的失真。¹¹¹ 再如「父親」斷氣前的一幕，依魯迅回憶，「衍太太」催促著兒輩們快快呼叫。但依周作人的講法，衍太太根本沒有在場，魯迅那樣寫，「無非當她做小說裡的惡人，寫出她陰險的行為罷了。」¹¹² 因此，周作人稱魯迅的回憶文字為「詩」，重在「造作」，暗示其不真；自己則以「真實」為尚，不加一點虛構和花飾。¹¹³ 周作人的「校正」行動，點出魯迅偏於主觀的路向，可愛而不可信；同時也重申了自己「知之為知之」的態度，雖似平直，卻更加精確。事實上，這裡有意借用古希臘「詩與哲學之爭」來比況彼此的差異：魯迅是詩人，狂熱而瑰麗，但近於「小孩子的誑話」；自己則為愛智的哲人，苦語實說，諄諄「老者言」。

在《知堂回想錄》裡，還有兩個與「老」相關的重要話題。首先是「老人轉世」，此一「個人神話」昉自幼年時代的家族見聞。但在早先，他從未在散文裡公開敘說此事，而僅在五十自壽詩裡暗用此典（「前世出家今在家」）。因此，晚年加以詳說，仍可視為自我生命形象的一種確認。五四以降的新思潮，表面上高揚科學與民主，骨子裡卻偏好激情與幻想，更像是一個熱血沸騰的青年。周作人雖隸屬於新文化陣營，但更崇尚文化、理性與知識，便顯現出與時代格格不入的氣質。他以轉世的老人自居，則有雙重含義：一方面既非「初次做人」，也就累積了前世宿慧，更加懂得人世的情理；另一方面「有點頑梗，其不能討人們的喜歡，大抵是當然的了。」¹¹⁴ 前者是洞澈世事的憑藉，後者卻是與世相忤的根源。他對於「老」的矛盾性深有體會，而仍甘心於此，也算是求仁而得仁了。

另一個話題是「壽則多辱」。此語先前已見於筆下，但所述止於家庭論，且離自身仍有距離。晚年，他把這句話掛在嘴邊（甚至刻為圖章），卻是基於切身體

¹¹¹ 周作人，《魯迅的故家》（香港：上海出版公司，1953），〈後園〉、〈園裡的植物〉、〈園裡的動物二〉，頁6-19。

¹¹²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74），〈父親的病（下）〉，頁21。

¹¹³ 同前引，〈拾遺甲〉，頁429-430。

¹¹⁴ 同前引，〈老人轉世〉，頁2-4。

驗。¹¹⁵ 這段時期，八道灣舊居搬進許多戶人家，不再為周作人一家所獨有。原本深靜自在的苦茶庵，一變而為大雜院，他深受鄰擾之苦。家中有患癥症的老妻，紛擾不絕，致有厭世之想。¹¹⁶ 六十七歲生日，在感慨「壽則多辱」之餘，有云：

但我現今目的只在為人與為工作，自己別無關係。故仍願能忍辱負重，再多譯出幾部書來。那麼，生日還是可祝，即長生亦所希冀者也。雖然一方面死而速朽也，是極好的事。不過其利益只在個人而已。早晨孫兒輩來拜壽，後書此志感，寫畢，胸次灑然。¹¹⁷

周作人晚年蒙受罪名，出獄後以待罪之身居於家；在物質條件較匱乏的情況下，度過人生衰老的二十年。對於曾引領風騷的文化大師而言，確實尊嚴掃地，備感苦楚。他利用殘生譯成多種外國文學經典，利益眾生；也算是符應「含垢忍辱」的思維，實踐了「道義事功化」的理念。

周作人雖反對忠孝節烈等傳統德目，卻十分看重「人」的權利與尊嚴。因此，他在六十歲以後的處境，像是存身於異代的文化遺老，始終持守信念，以譯作為啟蒙之具。這樣的老年生涯雖似苟活，實有犧牲之意。即使在燈盡油枯之前，他終難逃紅衛兵的羞辱，慘然而逝。但若將此事視為寓言（青年崇拜走入極端，尊老重文的傳統日薄西山），則其啟迪意義至今依然常新。

四、結語

魯迅與周作人都深愴於「老之惡」而又頗迷於「老之魅」，這是他們之所以異於一般五四「新青年們」之處。此一傳統概念在兩人的身上，分別以不同的型態，與現代知識及域外傳統遭遇之後，遂產生了微妙的變奏與發展。魯迅的老辣銳進，與周作人的老苦斂退恰成兩種典型，他們共同展示了現代文章裡深埋著傳統文化因素。這種以「老」為主腦的美學，兼涉倫理與認知，實可與西方學界的「晚期風格

¹¹⁵ 按此語典出《莊子·天地》，乃是一種非典型的老年論。周作人中期的引述，見周作人，《風雨談》（上海：北新書店，1936），〈老年〉（1935），頁16；周作人，《瓜豆集》，〈家之上下四方論〉（1936），頁40。晚期則見《知堂回想錄》之〈緣起〉與〈後序〉，亦屢見於日記、書信。

¹¹⁶ 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八十心情》（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六十七歲生日日記〉（1951），頁72。

¹¹⁷ 錢理群，《周作人傳》，頁554。

論」進行對話；其間蘊含著漢語世界特殊的文化現象，應更適於用來闡釋當代作家的晚期書寫。

「老」可以從老年人身上抽離出來，成為一種概念，隨著時代脈絡與個體處境而變化。周氏兄弟皆參與反老人的新文化運動，深知傳統的利害所在；又皆在壯年，即已蒙上世故老人的封號，在人格與文風兩方面，屢被評為「老」。魯迅的老，彷彿「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亦即模仿傳統的老練與褻積來對付傳統勢力。周作人則吸納深思明智的「老者言」，轉化為適用於現代情境的智慧。前者重在刺世疾邪，下筆老辣嗆人；後者重在明哲保身，講究老苦回甘。

就近現代文化史來看，「青年性」屢被過度高揚；因而二周之「老」，頗有逆勢而為的意義。他們一生都堅守「幼者本位」的思維，只是隨著時勢變化，對於中老年情境有了較立體的反思。當所談論的人事物為「對象」，他們仍願以孩童與青年為優先；但當議題涉及「主體」狀態，他們不再菲薄「老」的深度與價值。於是在與青年反覆辯駁與協商的歷程中，加深了思維。因此，「尊老崇少之辯」既是在回應世界，亦關乎主體建構，故兼具社會性與思想性。

在漢語傳統中，常見「文章老更成」、「愈老愈剝落」、「人詩俱老」的談法，對老境書寫抱持著較正面的期待，並展現一種重視文化、修為與返璞歸真的思維。二周晚年都深受政治因素之牽絆，其外在處境與內在課題，頗異於古人。魯迅在病與死的陰影下，猶猛於戰鬥，以老辣之筆報復於睚眦；他演示了一種幽黯不安的老境，發出百年老梟般的魔魅之聲。周作人的晚年拉得較長，從戰時、入監、幽居到文革，他以老苦抑斂之筆，疾虛妄，主冷靜，發展忍辱保身的思維。雖似發揚儒釋道的老年論述，但化載道為言志，有更多的現代意義。

時代早應脫離單向地「尊老」或「反老」的格局，但世代間的隔閡尚多。二周皆具解放孩童的意識，又深具老人心態，能夠融合漢語傳統文化與現代倫理觀念——這也正是他們來自五四而又超越五四的關鍵。置身於高齡化社會，如何從「我們的」文化脈絡裡建構「漢語老年學」，宜為迫切之事。二周對「老」的深切剖析，有助於以現代眼光反省其意義與價值；他們對晚境的體驗與轉化，則為我們樹立老年書寫的兩種典型。近代華人陷於「返老還童」的迷思，由來已久；重新發現「老」的內涵與魅力，此其時矣。

（責任校對：李奇鴻）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毛 亨 Mao Heng 傳，鄭玄 Zheng Xuan 箋，《毛詩鄭箋》*Maoshi Zhengjian*，臺北 Taipei：臺灣中華書局 Taiwan zhonghua shuju，1983。
- 朱 熹 Zhu Xi，《晦庵集》*Hui'an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7。
- 葉 適 Ye Shi，《水心先生文集》*Shuixin xiansheng wenji*，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65。
- 歐陽詢 Ouyang Xun 撰，汪紹楹 Wang Shaoying 校，《藝文類聚》*Yiwen leij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9。
- 釋皎然 Shi Jiaoran，《詩式》*Shi shi*，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40。

二、近人論著

- 卜立德 David Edward Pollard 著，陳廣宏 Chen Guanghong 譯，《一個中國人的文學觀》*Yige Zhongguoren de wenxueguan*，上海 Shanghai：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2001。
- 王宏仁 Wang Hongren，《魯迅與「左聯」》*Lu Xun yu "zuolian"*，北京 Beijing：新星出版社 Xinxing chubanshe，2006。
- 北 斗（周作人）Bei Dou (Zhou Zuoren)，〈老人政治〉“Laoren zhengzhi”，《語絲》*Yusi*，4.41，上海 Shanghai：1928，頁 42。
- 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魯迅書信注釋組 Beijing shifan xueyuan Zhongwenxi Lu Xun shuxin zhushizu 編，《「圍剿」魯迅資料選編 1927-1936》“*Weijiao*” *Lu Xun ziliao xuanbian 1927-1936*，北京 Beijing：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魯迅書信注釋組 Beijing shifan xueyuan Zhongwenxi Lu Xun shuxin zhuyizu，1977。
- 本社 Benshe 編，《魯迅回憶錄》*Lu Xun huiyilu*，上海 Shanghai：上海文藝出版社 Shanghai wenyi chubanshe，1978。
- 仲 密（周作人）Zhong Mi (Zhou Zuoren)，〈祖先崇拜〉“Zuxian chongbai”，《每週評論》*Meizhou pinglun*，10，北京 Beijing：1919，第 2-3 版。
- 任 公（梁啟超）Ren Gong (Liang Qichao)，〈少年中國說〉“Shaonian Zhongguo shuo”，《清議報》*Qingyi bao*，35，橫濱 Yokohama：1900，頁 2249-2250。

- 西 滢 Xi Ying, 〈閑話的閑話之閑話引出來的幾封信〉之九〈西滢致志摩〉“Xianhua de xianhua zhi xianhua yinchulai de jifeng xin” zhi jiu “Xi Ying zhi Zhimo”, 《晨報副刊》*Chenbao fukan* (北京 Beijing), 1926 年 1 月 30 日, 頁 58-60。
- 李長之 Li Zhangzhi, 《魯迅批判》*Lu Xun pipan*, 上海 Shanghai: 北新書店 Beixin shudian, 1936。
- 李景彬 Li Jingbin、邱夢英 Qiu Mengying, 《周作人評傳》*Zhou Zuoren pingchuan*, 重慶 Chongqing: 重慶出版社 Chongqing chubanshe, 1996。
- 杜 荃 Du Quan, 〈文藝戰上的封建餘孽——批評魯迅的「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Wenyi zhan shang de fengjian yunie: piping Lu Xun de ‘wo de taidu qiliang he nianji’”, 《創造月刊》*Chuangzao yuekan*, 2.1, 上海 Shanghai: 1928, 頁 142-150。
- 汪湧豪 Wang Yonghao, 《中國文學批評範疇及體系》*Zhongguo wenxue piping fanchou ji tixi*, 上海 Shanghai: 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 2007。
- 汪 暉 Wang Hui, 《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Fankang juewang: Lu Xun ji qi wenxue shijie*, 石家莊 Shijiazhuang: 河北教育出版社 Hebei jiaoyu chubanshe, 2000。
- 長 虹 Chang Hong, 〈走到出版界〉之「1925 年, 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Zoudao chubanjie” zhi ‘1925 nian, Beijing chubanjie xingshi zhizhangtu’, 《狂飆》*Kuangbiao*, 5, 北京 Beijing: 1926, 頁 139-150。
- , 〈走到出版界〉之「時代的命運公理與正義的對話」“Zoudao chubanjie” zhi ‘shidai de mingyun gongli yu zhengyi de duihua’, 《狂飆》*Kuangbiao*, 10, 北京 Beijing: 1926, 頁 295-299。
- 林語堂 Lin Yutang, 〈悼魯迅〉“Dao Lu Xun”, 《宇宙風》*Yuzhou feng*, 32, 上海 Shanghai: 1937, 頁 394-395。
- 知 堂(周作人) Zhi Tang (Zhou Zuoren), 〈老年的書〉“Laonian de shu”, 《輿論週刊》*Yulun zhoukan*, 1.5, 北京 Beijing: 1937, 頁 17-20。
- 周作人 Zhou Zuoren, 《談龍集》*Tan long ji*, 上海 Shanghai: 開明書店 Kaiming shudian, 1927。
- , 《永日集》*Yongri ji*, 上海 Shanghai: 北新書局 Beixin shuju, 1929。
- , 《談虎集(上卷)》*Tan hu ji (shang juan)*, 上海 Shanghai: 北新書局 Beixin shuju, 1929。
- , 〈志摩紀念〉“Zhimo jinian”, 《新月》*Xinyue*, 4.1, 上海 Shanghai: 1932, 頁 215。
- , 《看雲集》*Kan yun ji*, 上海 Shanghai: 開明書店 Kaiming shudian, 1932。

- _____, 《雨天的書》 *Yutian de shu*, 上海 Shanghai: 北新書局 Beixin shuju, 1933。
- _____, 《知堂文集》 *Zhitang wenji*, 上海 Shanghai: 天馬書店 Tianma shudian, 1933。
- _____, 〈偶作打油詩兩首〉“Ouzuo dayoushi liang shou”, 《人間世》 *Renjian shi*, 1, 上海 Shanghai: 1934, 頁 4。
- _____, 《苦茶隨筆》 *Kucha suibi*, 上海 Shanghai: 北新書局 Beixin shuju, 1935。
- _____, 《苦竹雜記》 *Kuzhu zaji*, 上海 Shanghai: 良友圖書公司 Liangyou tushu gongsi, 1936。
- _____, 《風雨談》 *Fengyu tan*, 上海 Shanghai: 北新書局 Beixin shuju, 1936。
- _____, 《瓜豆集》 *Guadou ji*, 上海 Shanghai: 宇宙風社 Yuzhoufeng she, 1937。
- _____, 《藥味集》 *Yaowei ji*, 北京 Beijing: 新民印書館 Xinmin yinshuguan, 1942。
- _____, 《苦口甘心》 *Kukou ganxin*, 上海: 太平書局 Taiping shuju, 1944。
- _____, 《藥堂雜文》 *Yaotang zawen*, 北京 Beijing: 新民印書館 Xinmin yinshuguan, 1944。
- _____, 《魯迅的故家》 *Lu Xun de gujia*, 香港 Hong Kong: 上海出版公司 Shanghai chuban gongsi, 1953。
- _____, 《知堂乙酉文編》 *Zhitang yiyou wenbian*, 香港 Hong Kong: 三育圖書文具公司, Sanyu tushu wenju gongsi, 1961。
- _____, 《知堂回想錄》 *Zhitang huixiang lu*, 香港 Hong Kong: 三育圖書文具公司 Sanyu tushu wenju gongsi, 1974。
- _____, 《飯後隨筆》 *Fanhou suibi*, 石家莊 Shijiazhuang: 河北人民出版社 Hebei renmin chubanshe, 1994。
- _____, 《木片集》 *Mupian ji*, 石家莊 Shijiazhuang: 河北教育出版社 Hebei jiaoyu chubanshe, 2002。
- 郁達夫 Yu Dafu 編, 《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 *Zhongguo xinwenxue daxi, sanwen erji*, 上海 Shanghai: 良友圖書公司 Liangyou tushu gongsi, 1935。
- 夏濟安 Xia Ji'an 著, 林以亮 Lin Yiliang 譯, 《夏濟安選集》 *Xia Ji'an xuanji*, 臺北 Taipei: 志文出版社 Zhiwen chubanshe, 1971。
- 殷海光 Yin Haiguang, 〈成見與進步〉“Chengjian yu jinbu”, 《文星》 *Wenxing*, 5.5, 臺北 Taipei: 1960, 頁 5-9。
- 耿傳明 Geng Chuanming, 《周作人的最後 22 年》 *Zhou Zuoren de zuihou 22 nian*, 北京 Beijing: 中國文史出版社 Zhongguo wenshi chubanshe, 2005。

- 常燕生 Chang Yansheng, 〈越過了阿 Q 的時代以後〉“Yueguo le A Q de shidai yihou”, 《長夜》*Changye*, 3, 上海 Shanghai: 1928, 頁 9。
- 張 挺 Zhang Ting、江小惠 Jiang Xiaohui 編, 《周作人早年佚簡箋注》*Zhou Zuoren zaonian yijian jianzhu*, 成都 Chengdu: 四川文藝出版社 Sichuan wenyi chubanshe, 1992。
- 曹聚仁 Cao Juren, 《魯迅評傳》*Lu Xun pingzhuan*, 香港 Hong Kong: 世界出版社 Shijie chubanshe, 1956。
- 梅家玲 Mei Chia-ling, 〈發現少年, 想像中國: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Faxian shaonian, xiangxiang Zhongguo: Liang Qichao ‘shaonian Zhongguo shuo’ de xiandaixing, qimeng lunshu yu guozu xiangxiang”, 《漢學研究》*Hanxue yanjiu*, 19.1, 臺北 Taipei: 2001, 頁 249-276。
- 許廣平 Xu Guangping, 《欣慰的紀念》*Xinwei de jinian*, 北京 Beijing: 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1951。
- 陳子善 Chen Zishan、張鐵榮 Zhang Tierong 編, 《周作人集外文》*Zhou Zuoren jiwaiwen*, 海口 Haikou: 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 Hainan guoji xinwen chubanzhongxin, 1995。
- 散 木 San Mu, 《于無聲處聽驚雷——魯迅與文網》*Yu wushengchu ting jinglei: Lu Xun yu wenwang*, 天津 Tianjin: 百花文藝出版社 Baihua wenyi chubanshe, 2002。
- 舒 蕪 Shu Wu, 《周作人的是非功過》*Zhou Zuoren de shifei gongguo*, 瀋陽 Shenyang: 遼寧教育出版社 Liaoning jiaoyu chubanshe, 2000。
- 馮乃超 Feng Naichao, 〈人道主義者怎樣地防衛著自己?〉“Rendao zhuyi zhe zenyangdi fangwei zhe ziji?”, 《文化批判》*Wenhua pipan*, 4, 上海 Shanghai: 1928, 頁 52-56。
- 馮雪峰 Feng Xuefeng, 《回憶魯迅》*Huiyi Lu Xun*, 北京 Beijing: 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1952。
- 楊 牧 Yang Mu, 《失去的樂土》*Shiqu de letu*, 臺北 Taipei: 洪範書店 Hongfan shudian, 2002。
- 楊 澤 Yang Ze, 《魯迅散文選》*Lu Xun sanwen xuan*, 臺北 Taipei: 洪範書店 Hongfan shudian, 1996。
- 葉靈鳳 Ye Lingfeng, 〈魯迅先生〉“Lu Xun xiansheng”, 《戈壁》*Gebi*, 2, 上海 Shanghai: 1928, 頁 1。
- 廖久明 Liao Jiuming, 《高長虹與魯迅及許廣平》*Gao Changhong yu Lu Xun ji Xu Guangping*, 北京 Beijing: 東方出版社 Dongfang chubanshe, 2009。

- 劉人鵬 Liu Jen-peng, 〈「西方美人」慾望中的「中國」與「二萬萬女子」：晚清以迄五四的國族與婦女〉“‘Xifang meiren’ yu wang zhong de ‘Zhongguo’ yu ‘er wan wan nüzi’: wanqing yiqi wusi de guozu yu funü”, 《清華學報》 *Qinghua xuebao*, 30.1, 新竹 Hsinchu: 2000, 頁 1-47。
- 劉緒源 Liu Xuyuan, 《解讀周作人》 *Jiedu Zhou Zuoren*, 臺北 Taipei: 秀威資訊 Xiuwei zixun, 2009。
- 廚川白村 Kuriyakawa Hakuson 著, 魯迅 Lu Xun 譯, 《出了象牙之塔》 *Chu le xiangya zhi ta*, 臺北 Taipei: 昭明出版社 Zhaoming chubanshe, 2000。
- 鄭清茂 Cheng Ching-mao, 〈周作人的日本經驗〉“Zhou Zuoren de Riben jingyan”, 收入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Zhongyang yanjiuyuan di er jie guoji Hanxue huiyi lunwenji bianji weiyuanhui* 編, 《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文學組》 *Zhongyang yanjiuyuan di er jie guoji Hanxue huiyi lunwenji, wenxuezu* 下冊, 臺北 Taipei: 中央研究院 Zhongyang yanjiuyuan, 1989, 頁 881-887。
- 鄭學稼 Zheng Xuejia, 《魯迅正傳》 *Lu Xun zhengzhuan*, 臺北 Taipei: 時報文化 Shibao wenhua, 1978。
- 魯 迅 Lu Xun, 《魯迅三十年集補遺》 *Lu Xun sanshi nian ji buyi*, 香港 Hong Kong: 新藝出版社 Xinyi chubanshe, 1967。
- 魯 迅 Lu Xun 著,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Lu Xun xiansheng jinian weiyuanhui 編, 《魯迅三十年集》 *Lu Xun sanshinian ji*, 上海 Shanghai: 魯迅全集出版社 Lu Xun quanji chubanshe, 1947。
- 適(胡適) Shi (Hu Shi), 〈我的兒子〉“Wo de erzi”, 《每週評論》 *Meizhou pinglun*, 33, 北京 Beijing: 1919, 第 3 版。
- 賴芳伶 Lai Fang-ling, 〈儒而近墨：試論周作人〉“Ru er jin Mo: shilun Zhou Zuoren”, 《東華人文學報》 *Donghua renwen xuebao*, 11, 花蓮 Hualian: 2007, 頁 235-267。
- 錢杏邨 Qian Xingcun, 〈死去了的阿 Q 時代〉“Siqule de A Q shidai”, 《太陽月刊》 *Taiyang yuekan*, 3, 上海 Shanghai: 1928, 頁 1-24。
- 錢理群 Qian Liqun, 《周作人傳》 *Zhou Zuoren zhuan*, 北京 Beijing: 十月文藝出版社 Shiyue wenyi chubanshe, 1990。
- , 《走進當代的魯迅》 *Zoujin dangdai de Lu Xun*,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1999。
- 鍾叔河 Zhong Shuhe 編, 《周作人文類編：八十心情》 *Zhou Zuoren wen leibian: bashi xinqing*, 長沙 Changsha: 湖南文藝出版社 Hunan wenyi chubanshe, 1998。

- 顏健富 Guan Kean-fung, 〈發現孩童與失去孩童——論魯迅對孩童屬性的建構〉
“Faxian haitong yu shiqu haitong: lun Lu Xun dui haitong shuxing de jiangou”, 《漢
學研究》 *Hanxue yanjiu*, 20.2, 臺北 Taipei: 2002, 頁 301-325。
- 蘇雪林 Su Xuelin, 《我論魯迅》 *Wo lun Lu Xun*, 臺北 Taipei: 文星書局 Wenxing
shuju, 1967。
- 伊藤虎丸 Itō Toramaru, 《魯迅と終末論——近代リアリズムの成立》 *Ro Jin to
shūmatsu ron: kindai riarizumu no seiritsu*, 東京 Tokyo: 龍溪書舍 Ryūkei
shosha, 1975。

Lu Xun, Zhou Zuoren, and “Oldness”

Liu Cheng-chu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zzliu@ntu.edu.tw

ABSTRACT

Although Lu Xun 魯迅 and Zhou Zuoren 周作人 have repeatedly given public discourses on “opposing the elders,” in reality, they are unable to completely break with “oldness” culture. What is more, they are afraid of the “evils of oldness” and fascinated by the “charms of oldness”; t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and the “new youths.” Chinese culture has a profound tradition of respecting the aged and even aestheticizes and ideologizes “oldness.” However, in modern China, facing national crisis, intellectuals are filled with the desire for “rejuvenation.” While the Zhou brothers are participating in this trend, they can also transform traditional resources and separately construct ways of thinking about “oldness” to confront the youths. Finall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Zhou brothers’ development processes and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and, in doing so, illuminates the spiritual world of the May Fourth era literati.

Key words: May Fourth era, rejuvenation, the charms of oldness

(收稿日期：2018. 7. 30；修正稿日期：2018. 10. 17；通過刊登日期：2018. 11. 28)